

方立天文集

第一卷

- 第一卷 中国佛教
-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佛教
- 第三卷 法藏与《金师子章》
- 第四卷 佛教哲学
- 第五卷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
- 第六卷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 第七卷 中国佛教文化
- 第八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
- 第九卷 中国古代哲学（上下）
- 第十卷 杂著

中国佛教





● 2005年秋。



● 1949年春，浙江永康初中毕业时留影。



● 1956年，赴北京大学学习前摄于上海。



● 1961年春，大学毕业前摄于北大西门。



● 1961年7月，大学毕业时摄于北京天安门。



● 1962年3月，摄于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



● 1962年5月1日，摄于北京陶然亭公园。



● 1978年，日本友人丘山新摄于人大红三楼。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狮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的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

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部分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

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

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

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己！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

方立天

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

论隋唐时代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	001
略论中国佛教的特质	038
试论中国佛教之特点	046
佛教与中国社会	075
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概述	087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104
两岸佛教交流活动的意义和感想	126
略论我国的弥勒信仰	128
安祥禅	
——中国禅法的新篇章	137
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一）	142
宝岛台湾归来话佛教（二）	146
如何全面认识玄奘的形象与思想	154
佛学研究的现代化和佛教中国化	158
禅宗精神	
——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	162
弥勒信仰在中国	171
从中国佛教净土思想的演变看传统与现代的转换	192

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	
——为纪念中国佛教两千年而作	205
中国佛教两千年	213
自力与他力	
——宋以来中国佛教修行的基本走向	217
弘法利生：当代佛教的主旋律	
——“佛教在 21 世纪的使命”演讲比赛评述	222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27
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37
中国大陆、港、台三地佛教之发展现况与路向	251
人间佛教的界说与人间正道的实践	261
佛教必须现代化	269
培育僧才的摇篮	
——香港佛教僧伽学院访问记	274
中国禅宗创始人之辨析	280
南岳禅系的佛教平民化倾向	286
弥陀净土理念：净土宗与其他重要宗派终极信仰的共同基础	295
永明延寿与禅教一致思潮	301
佛教基本知识概说	311
少林寺当走文化佛教之路	354
在“少林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355
佛教论坛与佛学研究	358
心从“正见”始	
——兼论佛教正见与世界和谐	362
华林禅寺：禅源初地	369
佛教伦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三个向度	371
普贤的实践品格及其现代价值	379
温家宝总理与我谈佛教	388
慧能创立禅宗与佛教中国化	390
黄金纽带可融冰	402

三种精神和三大夙愿	
——慈航法师留给后人的启示	408
朝阳佛教文化的历史特点及其当前建设	
——在首届“朝阳佛教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412
在中日临济宗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兼《东瀛禅语》 发行纪念会上的致词	414
重“禅”与重“性”	
——对太虚法师“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一点思考	416
基于人间佛教理念的淑世情怀	
——在“纪念赵朴初诞辰一百周年暨首届 佛教慈善论坛”上的发言	422
发挥佛教艺术的感染作用 推进精神文明的良性建设	
——在“释迦塔与中国佛教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424
佛教的历史演变与文化内涵	426
佛教：科学之友	437
都市佛教与市民素质	443
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以汉传佛教为中心	446
当代佛教要重视阐扬佛教核心思想“缘起论”	478
长安佛教的历史地位	481
正定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发展之路	490
门外看生活禅	492
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	497

论隋唐时代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

我国佛教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宗派，到了隋唐时代，自成体系的佛教集团相继纷然蔚起，各具特点的教派标然林立，而且壁垒森严，竞相争逐。唐末五代以后佛教又转趋衰落了。隋唐佛教既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以后的佛教。隋唐以后，尽管也有人继续在标榜某宗某派的信仰，但是面目、精神已经不同了。因此，探讨和研究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佛教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以及我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概貌，因而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佛教自汉代开辟西域，通过中亚细亚传入我国以后，魏晋时译经不断增多，当时中国僧人对这种经典的理解，由于受社会上广泛流行的玄学不同流派的影响等种种原因，而形成了不同观点，如讨论般若学的六家七宗^①。这里所谓“宗”就是“家”，近似于学派，因此“七宗”也就是“七家”或七个学派。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转而

* 本文系与石峻先生合作。

^① 六家七宗，东晋时代佛教般若学派别。一般认为本无、即识、识含、幻化、心无、缘会为六家，加上本无宗的分支本无异为七宗。

重视讲诵佛典，专攻不同的经论之风大盛，出现了若干知名的经师、论师，如所谓涅槃师^①、成实师^②和毗昙师^③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提章比句”，谈不上什么发挥和创新。所以，当时佛教也只出现基于对不同经论的讲解而形成不同观点的学派。佛教进入隋唐时代，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首先是寺院经济的膨胀，由原来讲习经论进而建立起各种宗派。所谓佛教宗派就是有了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更加强调传法世系的不同，这又显然是与财产的继承权直接相关的。换言之，宗派也就不仅是佛教学说不同，而且是代表不同势力和不同利益的集团。宗派和学派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相异之处。佛教由出现学派进而形成宗派，是专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那么，历史地形成隋唐佛教宗派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呢？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客观条件，而其中首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是和当时我国从长期分裂到统一的政治局面直接相联系的。此时封建帝国的统一政权，要求有相应的统一的宗教。因为，南朝末年和隋代末年的农民起义，使统治者现实地看到，为了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防止农民起义的再起，必须利用佛教界有声望和影响的人物来为自身的统治服务，即利用佛教信仰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初，炀帝于东都（洛阳）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④ 隋炀帝设法集中南北各地名僧，就反映了建立统一的佛教的需要。又如唐太宗认为农民起义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⑤。这个比较正确的总结，启发了唐太宗十分重视人民的“廉耻”。所以，他本人虽不怎么信仰佛教，但也看到佛教实在具有愚弄人民思想、控

① 涅槃，本义是“寂灭”、“灭度”，即佛教所谓经过修行悟解而达到的最高境界。这里指《涅槃经》，南北朝时专事宣讲此经的，称“涅槃师”。

② 成实，指鸠摩罗什所译的河黎跋摩《成实论》，南北朝时专事宣讲此论的，称“成实师”。

③ 毗昙，佛教小乘一切有部论集的总称。南北朝时专事宣讲这些论的，称“毗昙师”。

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

⑤ 《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见《资治通鉴》卷192。